

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藏 徐光啟作品三種譯跋

董少新*

本文中的三篇徐光啟作品，包括〈進士保祿覆樞機主教貝拉爾米諾致中國全體教徒書〉、〈中國禮部徐光啟保祿致澳門尊敬的巡按使神父書〉和〈徐保祿捍衛葡人疏〉，中文本已佚，幸運的是葡文本得以保留至今，故將其譯為中文，略加註釋與跋語，這對正在進行的《徐光啟全集》編纂工作將是重要的補充。

明末重臣徐光啟(1562-1633)一生各類著述甚豐，現存徐光啟文集有數種⁽¹⁾，其中王重民先生所輯之《徐光啟集》堪稱收羅最廣，然仍憾其未能完備。梁家勉先生在《徐光啟集校記補》中不無感慨地說：“‘文章千古事’，徐光啟的文章，畢竟是‘不廢江河萬古流’，今後，一部‘帶校註性質’的新集，能否勝利完成它？何時完成它？據當前形勢看來，答案是樂觀的，大有希望在！”⁽²⁾但是，又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梁家勉先生的這一樂觀的願望至今仍未實現。

我近年在葡萄牙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Biblioteca da Ajuda)翻閱耶穌會檔案，無意間發現了三件徐光啟的作品，包括兩封書信和一份奏疏，均為17世紀葡萄牙文、18世紀中葉抄本。徐光啟未通葡語，故這三件作品當為其時與徐光啟交往的耶穌會士或通事據中文原文所譯。翻檢已刊各種徐光啟作品集，我發現此三件作品均未被收入，由此推測其中文原本或已遺失，故將其回譯為中文，結合中西原始文獻略加校釋，並為每篇文獻略撰數語加以介紹，或可為將來輯成“帶

校註性質的新集”之一助。另，徐光啟原文為文言文，但因譯者水平有限，祇能將其譯為現代漢語，尚祈讀者見諒。

〈進士保祿⁽³⁾覆樞機主教貝拉爾米諾 致中國全體教徒書〉

尊貴崇高且令人尊敬的樞機主教大人，您偉大的虔誠與慈悲比浩瀚的海洋和無盡的大地都寬廣，其光芒猶如一道精神之火照亮了我們，並足以照亮我們整個中國。

尊貴的先生，您的信函在我們這裡被反複傳閱，尤其是很多進士和士大夫都閱讀了；一些內閣大員也都讀了您的信，這些內閣大員有的在治理着國家，有的則曾經主持政務，而現在已經致仕還鄉。他們中仍有很多尚未領受聖洗，但急切地渴望以熾熱的善心來行事，而這正是您對我們所有人的希望。因上帝和我們的救世主耶穌基督之聖寵，我們中的一些人已經領受了聖洗，我們越發希望改造我們的生活，使其變得更為美

* 董少新，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乃復旦大學“985工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文史研究院研究項目(EYH3801004)、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KRH3801001)及上海市浦江人材計劃項目成果，特此致謝。

在中國的工作給予肯定。1616年5月20日，著名耶穌會士、樞機主教羅伯特·貝拉爾米諾 (Roberto Belarmino, 1542-1621) (6) 給全體中國教徒寫了一封信(見附錄一)，委託金尼閣將信帶回中國。信中表達了在得知中國教會發展情況後羅馬教廷的喜悅與滿意之情，告誡中國教徒，除了信上帝和耶穌基督外，還要按照教規與戒律的要求生活，在面臨困難與壓迫的時候要堅定和執著。金尼閣於1620年返回中國，向中國教徒轉交了貝拉爾米諾的信。當時南京教案(1616)的陰影尚未完全消散，樞機主教的信給中國教徒帶來了相當大的鼓舞。於是徐光啟代表全體中國教徒，給樞機主教寫了這封回信。信寫於北京，未註明時間，由於金尼閣於1620年抵達北京，1621年初即往南昌等地傳教，因此推測徐光啟此信應寫於1620年。據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云，貝拉爾米諾致中國教徒書以及徐光啟的回信於1625年在巴黎刊佈於《諸年信割》(Lettres Annuelles)中(7)，則徐光啟的回信在此前已經抵達了歐洲，祇是貝拉爾米諾於1621年9月17日已經去世，或未能收到此信。這兩封信在阿儒達圖書館均藏有抄本(8)，上面徐光啟之回信及附錄一貝拉爾米諾致中國教徒書，便是根據該圖書館藏本翻譯的。徐光啟能夠代表中國所有教徒給貝拉爾米諾樞機主教回信，說明他在1620年已經成為中國天主教界的首要人物，從該信亦可看出其信仰之堅定，以及對天主教義的理解之深入；但以往所輯的徐光啟文集，對其宗教信仰方面的作品收入較少，故此信應可視為一個重要的補充。

〈中國禮部徐光啟保祿致澳門尊敬的耶穌會巡按使神甫書〉(10)

我主上帝保佑巡按使神甫閣下。借此良機，請允許我以應有的尊重與敬意致函巡按使神甫閣下，討論一些重要事宜。澳門城以熱忱和忠誠，派遣統領兼使節(11)率領戰士和其他人員，攜帶火炮及其它精良兵器，

來援助我皇陛下，抗擊鞑靼人。在帝國的邊境，這些鞑靼人已經造成巨大的破壞；在抗擊鞑靼人的戰爭中，巡按使閣下和澳門城鼎力相助，並獻計獻策。

統領兼使節及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到達之時，朝廷內外正因外敵的入侵而陷入混亂，京城附近已經有大批人死亡，並造成極大的破壞，而名震天下的葡萄牙人到來後，敵人已經退回到帝國的邊境，現正盤踞在那裡。(12)朝廷又恢復了平靜與安寧，這使我皇陛下及朝廷上下都十分感激，對保衛帝國的統領和來自帝國不同地區的人們都非常器重，而對上帝賦予葡萄牙人的才能與名望尤其敬重。巡按使神甫閣下似乎想通過信徒在帝國內做一番大事業，以為上帝服務。正如您所清楚知道的那樣，在近千年前的唐朝，天主教曾繁榮昌盛(13)，但後來由於多種因素而消失了(14)。此後，在我們的大明王朝，我主上帝通過耶穌會的神甫——我們的教師，使天主教再次得到宣揚，欲使其神聖經典傳遍帝國的每個角落，使每個人都認識造物主和救世主，以展示上帝的最高智慧。

來自澳門城的統領兼使節和其他人，通過我向我皇陛下建議(15)，為了結束戰爭，最好從澳門調派一些葡萄牙武裝戰士，在皇帝的訓練指揮下，投入抗擊帝國境內鞑靼人的戰爭中。皇帝高度評價了葡萄牙人保衛帝國的忠誠與熱心，並對使用來到這裡的少量葡萄牙武裝這一經驗十分滿意。皇帝派遣一使臣(16)前往廣州和澳門，與其同往的有耶穌會陸若漢神甫。皇帝對陸神甫的多次熱誠勸忠感到非常滿意，故派他一同前往廣州和澳門，以便在短時間內與救兵一起返回。他們到達的時候，敵人就必須得將所有兵力投入到戰爭中了。

神甫攜有皇帝詔書一份，慷慨特許使團一切相關需要都由該省的都堂(Tū tam)(18)和察院(cha yüen)(19)承擔。該省都堂和察院對忠誠的澳門城提供特殊的保護與關心。詔書還命令他們負責神甫一行的所有開銷，並向將從那裡來此的葡萄牙人提供一切所需。

trahendo Munda de curia... (Handwritten Latin text, top left)

Carta Escrita em Janeiro de 1616... (Handwritten Latin text, middle left)

Carta Escrita em Janeiro de 1616... (Handwritten Latin text, bottom left)

... (Handwritten Latin text, top right)

... (Handwritten Latin text, middle right)

... (Handwritten Latin text, bottom right)

... (Handwritten Latin text, bottom right)

... (Handwritten Latin text, bottom right)

... (Handwritten Latin text, bottom right)

... (Handwritten Latin text, bottom right)

〈羅伯特·貝拉爾米諾樞機主教致中華帝國基督徒書〉及〈進士保祿覆樞機主教貝拉爾米諾致中國全體教徒書〉(二)
資料來源：BA, JA, Cod.49-v-5, fls.187v-190v.

我由衷地確信，以巡按使閣下對此天主教會和帝國的熱誠，以及閣下、澳門總兵、主教對帝國所奉獻的才能和劬勞，陸神甫會在最短的時間內，與一同前往的皇帝使臣，以及所請求的武裝一起返回，因為我們對我主上帝充滿信心，知道隨着他們的到來，戰爭很快便會結束。澳門城將名譽永垂，同時將從我皇陛下那裡接受諸多優待，而澳門將永遠享受這些優待。我所委託陸神甫及其隨行人員的就這些了，通過迢迢征途，隨信奉送薄禮。

崇禎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按照慣例，鄙名寫在另一張紙上
徐保祿(Paulo Syú)⁽¹⁹⁾

跋

明末後金崛起於遼東，對中國的威脅逐漸增大。萬曆四十七年(1619)明軍大敗於薩爾滸，以徐光啟、李之藻為首的奉教官員於是數次上疏，建議購買西洋火炮、招募澳門葡軍抗擊滿族人之入侵。⁽²⁰⁾崇禎元年(1628)，澳門派公沙·的西勞為統領兼使節，耶穌會士陸若漢(João Rodrigues, 1561-1634)⁽²¹⁾為使團代理主教，率三十二名銃師、僱伴等，攜西洋大炮等武器，從澳門出發前來北京。他們行至涿州時，正遇上一支滿軍南下，並在攻佔了良鄉後，繼續攻打涿州。在公沙·的西勞的指揮下，西洋大炮被架到涿州城上。滿軍聽說葡萄牙人帶來很多威力巨大的火炮後，不戰而退。公沙·的西勞一行人等於1630年2月14日(崇禎三年正月初三)抵達北京。他們在京師向眾官員展示了西洋火炮的威力，獲得了皇帝及多位高官的讚揚。公沙·的西勞向徐光啟建議，再從澳門調遣三百葡兵，以及更多的火器，以便徹底擊敗滿軍。徐光啟認為此建議非常有必要，便上疏皇帝，願親自前往澳門搬兵；崇禎皇帝批准了這一建議，但是不同意徐光啟親自前往，於是在徐光啟的建議下，派姜雲龍與陸若漢一同前去澳門搬兵。雖然陸若漢此前已經參與到了運送

葡兵洋炮之中，但是耶穌會內部對於向中國援助西洋火炮這一問題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耶穌會士認為傳教士任務在於傳播天主教義，不應該參與到戰爭之中。為了獲得耶穌會方面的全力支持，徐光啟便於1630年6月4日給當時耶穌會日本、中國巡按使班安德(André Palmeiro, 1569-1635)寫了這封信，讓陸若漢等人帶往澳門交給他，信中闡述了葡兵援華與天主教在華傳播的關係，以尋求耶穌會上層的支持。徐光啟之所以寫信給班安德，一方面是因為他擔任巡按使一職，擁有巡視遠東教務之權力；另一方面，徐光啟已經知道班安德神父對援明一事是支持的，因為班安德曾借公沙·的西勞等人入華効力之機，得以隨使團一同進入中國內地，開展了為期近一年(1628年11月-1629年10月)的教務巡查工作，走訪了廣東、江西、南京、浙江、山東、北京等省的各傳教駐地，在北京期間曾與徐光啟、孫元化等人見面，返回途中又特意前往上海，看望了徐光啟、孫元化的家人。⁽²²⁾

〈徐保祿捍衛葡人疏〉⁽²³⁾，1630年7月12日 7月14(崇禎三年六月初五日)獲諭批

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光啟上言：臣已做過新的調查，奉旨向陛下陳述臣的感言，恭請陛下明鑒。同時，我也請陛下允許我卸職還鄉，在我自己的家中安度晚年。

臣奉陛下之命掌理火炮及相關事務。現在臣又奉旨向陛下奏明如何最好地練兵與養兵。在我手中有一個奏疏的抄本，即科吏盧兆龍所奏者，他在疏中論述了是否應該讓正在路上的葡萄牙人來，此疏中涉及到我。

臣仔細回顧，十三年前，是臣第一個講到，欲摧毀敵人，必借助火炮；臣立即尋找火炮，是臣第一個派人前往澳門尋獲四門火炮。現在各地均需要擁有火炮，但無一處能夠擁有。我們沒有這麼多火炮，也沒有這麼多人，即使有一些地方有這樣的火炮和人員，如果我們不能夠將其整合

成為一個整體以前往抗敵，我相信反叛的鞑靼人將不會得到懲處。正因為如此，才會徵三百葡萄牙人。儘管此一想法為公沙·的西勞統領所提出，但是他向陛下所奏之事，以及他向陛下所請求的條例，我也都知道，所以我不能夠坐視不管，保持沉默。

但是陛下知道，那時我希望獲得火炮以驅敵，並不僅僅是想獲得火炮，而是想鑄造更多的火炮，不僅因為鞑靼人的入侵，而且也因為荷蘭人，蓋荷蘭人是西方來的殘暴的海盜。澳門葡萄牙人是西方溫順的商人。那些海盜想搶劫這些商人，這些商人盡力以手中的火炮進行抵禦，故雙方均想盡量擁有最精良的火炮。

荷蘭人來到這裡已經二十年了⁽²⁴⁾，其間無論其船的數量還是火炮的數量均有大量增加。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野心不小。他們知道我們的帝國不使用巨炮，因此尚未重視我們中國。澳門的葡萄牙人擁有精良的火炮，可以依靠這些火炮自衛，然而他們知道自己地小人寡，因此希望投靠我們，從我們這裡得到幫助。

概言之，澳門葡萄牙人與荷蘭人的衝突，是荷蘭人想攻佔澳門，然後再覬覦我們的帝國。澳門葡萄牙人想在我們的帝國境內修築防禦工事，以抵禦荷蘭人的攻擊，荷蘭盜賊集中其所有力量以奪取澳門，而澳門葡人以堅定的決心，向我們的帝國表示出巨大的忠心。雙方之良莠，動機之好壞，臣看得很清楚。因此我想利用火炮摧毀鞑靼人，而葡萄牙人顯然將會竭盡全力助我們功成此事。這樣，我們帝國的人將看到火炮的巨大優勢，從今以後，我們的人將鑄造很多火炮，學習高超的鑄造技術，辨別和使用火炮。福建、廣東、浙江、南京以及其它沿海地區，將通過葡萄牙人獲得裝備，以應對他們所面臨的一切局勢。而荷蘭人得知我們的這些安排後，將會打消其覬覦中國的野心。但是那時，我的設想沒有被實施，此後數年，荷蘭人果真在澎湖建起堡壘和要塞，今日他們又定居於北港(Pequiam)，臺灣，⁽²⁶⁾這兩個地方距離福建省三四百里，幅員遼闊而富

足，而現在中國的流民、盜賊和叛亂者，招集倭寇，聚集在那裡，已經構成許多城市和村莊，人口眾多，城池堅固，裝備了火炮，荷蘭人的虎目從那裡日夜窺視着我們中國，而他們達到目的的最佳辦法，便是先佔據澳門，因為澳門對他們進行了最堅決的抵抗，澳門想建防禦工事也正是為此。

因此，儘管我們不願用葡人作為抵抗鞑靼人的先鋒，我今天也建議最好保留在澳門的葡人，以便通過他們保衛南部沿海地區。科吏盧兆龍對他的家鄉香山很關注，希望我們對澳門保持警惕，而不是將葡人趕走。但是陛下在那個省的官吏經常欺負、凌辱澳門葡人，造成了我們與澳門葡人之間的不和；因此，澳門葡人非常擔心，荷蘭人會懷疑陛下在廣東的官吏們能給澳門葡人提供幫助，而荷蘭人原本認為廣東官吏會幫助澳門的。那裡的葡人也有從澳門撤離的想法，而我非常擔心，葡人早上撤走，荷蘭人晚上就佔據那裡了。

這些荷蘭人在最初來這裡的時候也說自己是商人，說他們的誠意比葡萄牙人更大。但是根據我講過的這些事實來看，我認為葡萄牙人是商人，而商人是不會變為強盜的。荷蘭人是海盜，因此他們不想做貿易，從開始到現在他們的所作所為已說明了這一點，他們所注重的就是擁有更多裝備大量火炮的船、淡水和食物，然後一有機會便搶劫、擄掠，他們因此而獲得巨大財富，貴重之物堆積如山。而現在，有誰能夠使他們懼怕，使他們能夠放棄做惡，放棄搶劫的習俗，使他們安於在海上航行以賺取百分之十的利潤，如其他商人一樣？所有這些事情都需要慎重考慮。臣處心積慮已久，以前不敢向陛下奏明這些事情。

至於我們請的三百葡人和一千二百支火槍，儘管他們到來之時將已入秋，但是那時叛敵仍將在我們的帝國之內，我們便可用葡人將他們驅逐出去。即便敵人趕走，要想收復遼東、懲處北方叛亂分子，我們仍應該借助於葡萄牙人，讓他

們督導我們的訓練，精選兩三萬有經驗的士兵，將他們與葡兵組織在一起，提供花銷、供給、武器以及其它戰鬥物資，我們便將獲得所期望的勝利，兩年之內即可成功。為了征服所有韃靼人，並極大地節省開銷，這是萬全而唯一的策略，等戰勝敵人一兩次以後，我們的士兵就會重新振作，煥發生機，積極投入戰爭，那時我們便可以命葡萄牙人返回，而不必留他們在這裡兩年時間。總之，如果陛下的諸臣們認為沒有必要收復已失去的土地，或者他們有比我所講的策略更高明的計謀來收復土地，那麼毫無疑問，在三百葡人身上投入的花銷將是無用的，沒有任何好處，因為他們將幫不上我們甚麼忙。臣與科吏誰的意見更正確，還望陛下明鑒。

我接下來略述天主教，據說此教在唐代便已存在於中國，被稱為景教。該教認為，大君無始無終，即是我們的主，我們的主滌蕩我們的過錯，賦予我們美德，讓我們恪守應盡的義務。從貞觀年間開始，該教在中國發展、繁榮了兩百年，我們可以從一塊石碑的銘文中得到證明，該碑在前幾年發現於陝西省，看來這一聖教並不是在今日才傳入中國的，而是已經在中國非常久了。利瑪竇神父及他的會友用中文翻譯了數十部各類書籍，其中數學書籍並非最受推崇的，那些講述致命的罪惡、與此相反的美德以及對良心的考驗的書籍，是寫給每個人看的，因為書中每個辭彙都很明晰，都非常有用。

臣時常讀這些書以利臣之靈魂。於是該科吏說我受神父們蒙蔽，毫無顧慮，對真理麻木不仁，從不敢揭露事實真相。現在我也得承認，我是一個無能之人，缺少德行，且上了年紀，諸病纏身。在過去數年中，當敵人又來入侵，我不敢為自己着想，不能休息，無法顧及私人的事情，總是盡力效忠，為國効力；但是現在，國家邊事平靜，而反觀自己，並沒有盡甚麼力。因此我懇請陛下允許我卸職，以讓那些抱怨我的人滿意。我閉門獨處於陋室之中，但不會因此而忘記浩蕩皇恩。臣懷着敬畏、謹慎之心恭候皇上諭旨。

1630年7月14日皇上頒佈諭批

朕已閱覽您的奏疏。前來効力的葡萄牙人已表現出忠心，他們對我們帝國之防衛與援救已盡全力，對此朕毫不懷疑。至於他們講述的關於我們的那些事情，各地方總督在他們的奏疏中沒有提到。您徐光啟深謀遠慮，忠心効力，盡職盡責，這些朕均親眼所見，與您所言不符。朕命您安心休養，並繼續擔任您的職務，將您以前的策略付諸實施。欽此欽尊。

跋

從澳門招募葡兵招致一些官員的反對，其中尤其以禮科給事中廣東香山人盧兆龍的反對最為強烈。他於崇禎三年五月上〈王者有必勝之兵疏〉（見附錄二）云：“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習先臣戚繼光之傳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演，然後能揚威武哉？臣生長香山，知澳夷最悉，其性悍桀，其心叵測。”因此建議將已來之葡人“念彼遠來，則止可厚其賞賚，發回本澳”，而對即將到來之三百葡人“止之不召”。盧兆龍反對天主教，並認為徐光啟搬葡兵之舉實為“與夷人說天主也”。崇禎皇帝對此疏未置可否，而祇令“所司其酌議以聞”。於是徐光啟於1630年7月12日（崇禎三年六月初三）上奏該疏，駁斥盧兆龍的保守觀點。從這份奏疏中可以看到，徐光啟對荷蘭勢力有比較清楚的認識，並對荷蘭人和澳門葡人進行了區分，儘管其或為聽取澳門葡人的一面之詞，但亦具有一定的遠見卓識，故該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徐光啟於崇禎二、三年為從澳門招募葡兵葡炮事曾多次上疏，保存下來的有〈控陳迎銃事宜疏〉、〈西洋神器既見其益宜盡其用疏〉、〈風聞憤激直獻芻蕘疏〉等，但駁斥盧兆龍的這份奏疏卻未能留傳下來，這很可能是因為該疏亦為天主教進行了辯護。

徐光啟此疏奏後，盧兆龍針鋒相對，於1630年7月17日（崇禎三年六月八日）再上一疏（見附錄三），其中提到了徐光啟的這份奏疏，云其為“聞

言自醒”疏，但此疏葡文譯本被冠以“徐保祿捍衛葡人疏”之名。盧兆龍在其第二疏中再次強調了他的觀點：“澳夷即假為恭順，豈信為腹心，即火技絕精，豈當招入內地，據光啟之疏，謂閩廣浙直尚防紅夷生心，則皇居之內不當慮澳夷狡叛乎？捨朝廷不憂，而特憂夷人之不得其所，臣所未解也。”崇禎皇帝並未接納盧兆龍的這個意見。由姜雲龍、陸若漢調遣的三百葡兵已從澳門出發，但盧兆龍不死心，又於崇禎三年十

二月上疏，彈劾姜雲龍，告其貪汙錢糧，終於使崇禎皇帝改變主意，姜雲龍被革職回籍，已行至江西的葡兵被遣返，僅命陸若漢等人將火器運往京師。

阿儒達圖書館所藏葡文文獻中，除了有徐光啟此疏的葡文譯本，還有盧兆龍前兩疏的譯本。因盧兆龍疏保存於《崇禎長編》中，故不必翻譯，而僅將中文原疏附錄於後，以便與徐光啟疏作對照。

【附錄一】

耶穌會德高望重的羅伯特·貝拉爾米諾樞機主教致中華帝國基督徒書

我以耶穌基督的名義祝我們所有親愛的中國教友健康、幸福。

令人尊敬的金尼閣神父帶來的新消息使我們非常高興和愉悅。金神父經過長途跋涉，最終從遠東回到我們這裡。他向我們描述了廣袤的中華帝國的大門是如何開始向基督教——我們祇有在這一信仰中才能夠獲得永生——開啟的。作為歐洲各王國的首都，整個羅馬城都對這一消息感到興奮。而作為所有國王和基督教民——他們都接受和崇拜統治天地的唯一至高真神上帝——之父的教皇保羅五世對此也感到極為欣慰。

所有樞機主教和主教們，包括所有教士和羅馬人民，以及我們所服侍的至高無上的牧羊人，也都非常喜悅；因為事實上我們曾經非常痛心，這麼多世紀以來，在這個如此大的帝國中，有這麼多富有天分的人民，卻不知道他們真正的大父——造物之主，也不知道造物主的兒子耶穌基督；這印證了從世界肇始之初至耶穌降生期間所有預言家的預言：耶穌降生為人，承擔我們人類的罪惡，以使我们獲得永恆幸福。從前魔鬼因高傲而被從天上打入地獄的深淵之中，魔王是人類永遠的敵人，他們以處境的改變為藉口，對福音關起大門。但是現在，由於天賜之福，他們開始懂得福音教義不會奪取大地上的王國，相反會許諾並給予一個來自上天的王國。

因此，我們由衷地向所有人表示祝福，與此同時，也向我們自己表示祝賀，因為我們獲得了這麼多的基督教兄弟。

但是，為了獲得永生，僅僅信天主聖父及其聖子耶穌基督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在這個世界上有節制地、公正而虔誠地生活。所以我告誡你們，要在天主所指引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戒絕和警惕所有不公正、謊言和欺騙；發展和促進所有善功；在所有神聖的品行上都要取得進步，而首先要對上帝報以信念，相互之間也要以真誠和善良相待。如果你們為上帝之愛而將遭受一些疾苦和迫害，你們應該感到輕鬆和愉快，因為偉大的榮耀等待着你們。因為這是我們的大父上帝之願望，即要在忍耐中證明我們的信仰、願望和仁慈，猶如真金不怕火煉。

對於上帝來說，解除我們所有痛苦和憂愁並非難事；但是很多時候，他讓他的臣民們在一生中忍受大量的勞苦，以便將來使其在天國中獲得更大的榮耀和獎賞；上帝讓我們做其獨子耶穌基督的所行，與基督保持一致。耶穌基督在這個世界上從未停止過行善和受苦，他的言行成為指導我們的榜樣；他從誕生之日直至去世（死於十字架上）一直都非常謙卑，所以大父上帝將其榮昇至光輝的寶座之上，其名望

在一切名望之上；這樣不僅天國中的居民，而且地獄中的魔鬼也都拜倒在他的腳下，聆聽他的教誨；所以，如果我們為基督之愛，耐心地忍受迫害和勞苦，那麼基督就會提昇我們的低賤、卑微之軀，使其與基督的慈善之身相類。

對此我不必贅言，因為我知道與你們在一起的神父們正以誨人不倦的精神教育並勸導着你們。至高無上的上帝會保佑你們，並使你們保持耶穌基督的信仰。讓我們相互以兄弟般的情誼，祈禱我們獲得拯救。

1616年5月20日於羅馬

【附錄二】

盧兆龍：〈王者有必勝之兵疏〉⁽²⁶⁾

禮科給事中盧兆龍上言：聞中國尊則四裔服，內憂絕則外患消，未聞使驕夷釀釁輦轂也。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習先臣戚繼光之傳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演，然後能揚威武哉？臣生長香山，知澳夷最悉，其性悍桀，其心叵測，其初來貿易不過泊船於浪白外洋耳，厥後漸入澳地，初猶搭篷廠棲止耳，漸而造房屋，漸而築青洲山，又漸而造銃臺、造堅城，為內拒之計，蓄夷眾，聚兵糧，為顏行之謀，時駕番舶擅入內地，拒殺我官兵，掠我人民，擄我子女，廣收硝黃、鉛、鐵，以懷不軌。閩之奸徒，聚食於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粵之盜賊，亡命投倚為患者，不可數計。粵人不得安枕，數十餘年於茲矣。其歲輸課稅雖二萬金，然設將添兵，以為防禦，所費過之。時而外示恭順，時而肆逞兇殘，其借銃與我也，不曰彼自效忠，而曰漢朝求我，其鳴得意於異域也，不曰寓澳通商，而曰已割重地，悖逆之狀，不可名言。粵地有司與之為約，入城不得佩刀，防不測也，今以演銃之故，招此異類，躍馬持刀、彎弓挾矢於帝都之內，將心腹信之乎？將驕子之乎？猶以為未足，不顧國體，妄奏差官，而夷目三百人是請，夫此三百人者，以之助順則不足，以之釀亂則有餘，奈之何費金錢騷擾而致之也？謂其銃可用乎，則紅夷大炮，閩粵之人有能造之者，昨督臣王尊德所是也。其裝藥置鉛之法，與點放之方，亦已備悉矣。臣計三百夷人，自安家犒勞以及沿途口糧，夫馬到京，供給所費不貲，莫若止之不召，而即以此錢糧，鳩工鑄造，可得大銃數百具，孰有便焉。

中國將士如雲，貔貅百萬，及今教訓練習，尚可鞭撻四裔，攘斥八荒，何事外招遠夷，貽憂內地，使之窺我虛實，熟我情形，更笑我天朝之無人也？且澳夷專習天主教，其說幽渺，最易惑世誣民，今在長安大肆講演，京師之人信奉邪教十家而九，浸淫滋蔓，則白蓮之亂可鑒也。查成化年間，番僧領占竹誘惑漢人，演習番教，為禮科糾劾遣還；萬曆年間，番人龐迪我、王豐肅等煽惑京師，為禮部疏參驅逐。禮臣徐光啟夙擅談兵，臣嘉其志素負清望，臣重其人，而今忽取夷人入京，豈子儀借回紇之兵，但與夷人說天主也。以古況今，無乃不可，況又欽差一官，多帶員役，金牌遮道，招搖出都，一到地方必且貪夷賄，啟釁端矣。竊見近年以來，借取銃名色，騷擾多事，害不可言，臣故謂差官之當罷也。前東兵未退，臣言之恐夷日生心，致有他變，今各城已復內患宜防。輦轂之下，非西人雜處之區，未來者當止而勿取，見在者當嚴為防閑，如皇上懷柔異類，念彼遠來，則止可厚其賞賚，發回本澳，前日涿州運炮壓斃二夷，但當敕地方官厚葬，以服遠人之心，若夫澳中築舍築臺添課添米等事，彼或微功陳乞，弗可輕許，以貽後憂也。

帝謂：朝廷勵忠柔遠，不厭防微，此奏亦為有見，所司其酌議以聞。

【附錄三】

廣東禮科盧兆龍反對徐保祿的第二疏，7月17日(崇禎三年六月八日)

7月20日(崇禎三年六月十一日)獲得論批⁽²⁷⁾

禮科給事中盧兆龍上言：既然禮臣徐光啟重視給予外國人以榮譽，則微臣有責任阻止可能來臨的禍端。因此，我恭敬謹慎地再次聲明，要假以時日，試將事情調查清楚。

頃見演炮西夷，彎弓佩刀於帝都之內，實懷叵測之憂，故具王者有必勝之兵一疏，大意謂制勝自有長策，西洋異類不可引入中國，窺我虛實，啟彼戎心，且輦轂重地，招聚多夷，萬一變生意外，事關非細。

而禮臣徐光啟隨具聞言內省一疏，娓娓數百言，其大旨若為紅夷澳夷分順逆，又鯁鯁然為澳夷計保全謀久遠，何其深且切乎，然與臣所謂罷止續取之差以杜內釁者，固相背而馳，非對針之語也。澳夷即假為恭順，豈得信為腹心，即火技絕精，豈當招入內地。據光啟之疏，謂閩廣浙直尚防紅夷生心，則皇居之內不當慮澳夷狡叛乎？捨朝廷不憂，而特憂夷人之不得其所，臣所未也。

即其總括之兩言，曰紅夷之志欲剪澳夷，以窺中國，此言似矣；而曰澳夷之志欲強中國，以捍紅夷，則是堂堂天朝，必待澳夷而後強，臣前疏所謂笑我中國之無人者，此類是也。

火銃可以禦敵，未必可以以敵。而謂欲進取於東，問罪於北，此三百人可當前鋒一隊，臣未敢輕許。若謂威服諸邊二年為約，則愚所未能測也。果能二年得志，以省兵力，禮臣正當自信而肩任之，效與不效，與天下共見之，又何必以去就爭哉！

臣自幼習讀孔孟之書，改過遷善省身克己之事，經文備之矣。不識世間有天主一教，與所謂唐朝景教者。貞觀以後之唐碑，恐非堯舜以來之聖揆。微臣以白蓮為鑒戒，恐異教流行，禮臣以瑪竇為常師，恐異教不流行，又臣所未解也。

昔江統論着徙戎，韓愈疏諫佛骨，至今人且稱之。臣前疏雖迂，其說頗正，願存此段議論以為國家防微，以俟政府參酌，毋以部覆不行，遂委信遠夷而主盟邪教，以貽釁無窮也。

臣言夷人不可用，非言火炮不可用。乞皇上責成光啟始終力任，竟展其二年成功之志，勿因臣言以為卸擔，則臣之言未必非他山之助也。

帝以已經部議報聞。

【註】

- (1) 目前行世的徐光啟文集有：徐光啟：《徐氏庖言》五卷，明天啟七年或崇禎元年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徐文定公奏疏》明抄本三冊；陳子龍等輯：《徐文定公集》六卷，收入陳氏等輯《皇明經世文編》卷四百八十八至四百九十三，中華書局1962年據明末平露堂刻本影印；李秋編：《徐文定公集》四卷，上海慈母堂，1896年；《明相國徐文定公墨蹟》一冊，上海，1903年；徐允希編：《增訂徐文定公集》六卷首二卷，上海慈母堂，1909年；徐宗澤編：《增訂徐文定公集》六卷首二卷，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1933年；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徐光啟手跡》，中華書局，1962年；王重民輯：《徐光啟集》十二卷，中華書局，1962年，上海古籍，1984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徐光啟譯著集》二十冊，1983年。此外，明刻《治曆緣起》十二卷、《新刻甲辰科翰林館課》十二卷中對徐光啟相關文獻亦多有收錄。
- (2) 梁家勉：《徐光啟集校記補》，見王重民輯：《徐光啟集》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619。
- (3) 保祿為徐光啟洗名，在當時的西文文獻中，一般稱呼徐光啟為進士保祿(Doutor Paulo)、徐保祿(Syū [ciū, Siu] Paulo)，徐光啟成為大學士(1632)後，西文文獻也常稱其為徐閣老(Siu Colão)。

- (4) 此處即指沈淮等人發起的南京教案。
- (5) 南京教案爆發後，傳教士遭到驅逐，李之藻、楊廷筠等奉教士大夫將數名傳教士藏匿於自己家中。
- (6) 貝拉爾米諾為著名神學家。1560年加入耶穌會，曾在羅馬、帕多瓦大學和魯汶大學學習，1570年晉陞為神父。先在魯汶大學教神學，1576年奉教皇格利高里七世之命來到羅馬，任耶穌會羅馬學院院長，後來又擔任耶穌會納波里教省會長；1599年陞為樞機主教。其著作《論戰集》(Controvérsias)在出版後的三個世紀中一直有很大影響力。
- (7)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耿昇譯，中華書局，1995年，頁120。
- (8) 阿儒達圖書館(以下簡寫為BA)，*Jesuitas na Ásia* (《耶穌會士在亞洲》)文獻集，以下簡寫為JA)，Cod. 49-v-5, fls.187v-189 為貝拉爾米諾致中國教徒書抄件；fls.189-190v 為徐光啟代表中國教徒的回信。
- (9) 原文寫作 *Ciú quam ki Paulo*。
- (10) 阿儒達圖書館藏有兩份此信的抄件，見BA, JA, Cod. 49-v-8, fls.743v-744v; Cod. 49-v-9, fls.75v-76v。兩抄本除字體及個別單詞寫法不同外，基本一致。
- (11) 此統領兼使節即公沙·的西勞(Gonçalo Teixeira Correia, ?-1632)，葡萄牙人，入京前曾在澳門擔任過議事官和判事官。後隨孫元化在登州効力，並曾前往靠近朝鮮的皮島督戰。崇禎五年(1632)初，因孔有德發動吳橋兵變，在保衛登州過程中中箭負傷，於次日犧牲，在此戰役中去世的還有其他十二位葡萄牙人。參見António de Gouvea (何大化), *Ásia Extrema* (《遠方亞洲》), segunda parte, BA, JA, Cod. 49-v-2, pp. 256-158。公沙·的西勞等葡兵陣亡，使許多朝中官員感到惋惜，兵部尚書熊明遇上〈請贈恤登州死難受傷澳人疏〉，請皇帝撫恤陣亡、負傷之葡兵。參見《崇禎長編》卷五十八，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黃彰健校勘本，頁5-6。
- (12) 明朝此次招募的葡兵入京之時，正逢後金軍隊首次入關圍京(史稱“己巳之變”)，關於崇禎年間招募葡兵一事，參見董少新、黃一農：〈崇禎年間招募葡兵新考〉，《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頁65-86。
- (13) 指貞觀九年(635)傳入中國的景教，與此信寫作之時相隔九百九十五年。天啟年間西安發現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國天主教界和來華耶穌會士為之一振。
- (14) 唐武宗會昌(841-846)滅佛，景教亦遭禁絕。
- (15) 徐光啟所上〈聞風憤激直獻芻蕘疏〉，見《徐光啟集》卷六，頁298-300。
- (16) 此人即姜雲龍，關於姜雲龍奉使澳門事，參見黃一農：〈明末至澳門募葡兵的姜雲龍小考：兼答熊熊先生對“e-考據”的批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第62期，頁141-161。
- (17) 明代各衙署之長官因在衙署之大堂上處理重要公務，故稱堂官；都察院長官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以及被派遣到外省帶有這些兼銜的總督，巡撫，均通稱都堂。
- (18) 明代官職名。明於各省置巡按御史一人，專以察吏安民。因為巡按御史全銜為“巡按某處監察御史”，故稱為“巡按察院”，簡稱“察院”。
- (19) 此簽名見於 Cod. 49-v-8, f.744v., 而不見於 Cod. 49-v-9 的抄件中。
- (20) 關於徐光啟等人借助西洋火炮進行的軍事改革，參見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之西洋火炮〉，《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1996)，頁911-966；董少新、黃一農：〈崇禎年間招募葡兵新考〉，《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頁65-86。
- (21) 關於陸若漢及其參與葡兵葡炮入華事，參見 Michael Cooper, S. J., *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 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 New York & Tokyo: Weatherhill, 1974, pp. 335-355；湯開建、劉小珊：〈明末耶穌會著名翻譯陸若漢在華活動考述〉，《文化雜誌》2005年第55期，頁25-48。
- (22) 班安德回到澳門後，於1630年1月8日寫了一篇較長的報告，向羅馬耶穌會總長彙報在中國內地巡查的詳細情況，該報告見BA, JA, Cod. 49-v-6, fls.523-553v。
- (23) BA, JA, 49-v-9, fls. 65v-69。盧兆龍在一份反對徐光啟的奏疏中，引用徐光啟該疏，稱其為“聞言內省疏”，見附錄三。
- (24) 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1602)以後，為與葡萄牙人爭奪遠東海上貿易權，於1603年攻打澳門，此後又數次試圖武力攻佔澳門，其中以1622年的戰爭最為激烈，但均以失敗告終。故此處“二十年”不確切，或為“二十餘年”之誤。為抵禦荷蘭人的攻擊，澳門開始修建炮臺等防禦工事，因此與中國官方產生糾紛。澳門決定派遣葡兵援明，目的之一是想徵得明政府對其修築炮臺的認可。
- (25) 1603年攻打澳門未果，荷蘭人於1604年8月7日抵達澎湖，但12月15日被明軍驅離。162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再度佔據澎湖。1624年明軍與荷蘭經過8個月的戰爭後，荷蘭人退守臺灣，直至1662年被鄭成功驅逐。
- (26) 《崇禎長編》卷三十四，頁42-44。
- (27) 該疏題目及第一段為中文本所無，此故據葡文本(BA, JA, 49-v-5, fls.70-72)補。中文本見《崇禎長編》卷三十五，頁17-19。